

中華文史論叢

一九八六年第三輯



中華文史論叢

一九八六年第三輯

(总第三十九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ird Series 1986

中华文史论丛

一九八六年第三辑

(总第三十九辑)

朱东润 李俊民 罗竹风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1986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报刊登记证第 074 号 定价: 1.50 元

目 次

关于曾国藩的讨论

曾国藩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彭 靖 (3)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罪行不可否定·····	叶幼明 (29)
论曾国藩与天津教案·····	许山河 (41)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殷绍基 (57)
论曾国藩的文学地位·····	王镇远 (65)
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	邓广铭 (85)
论清代的“生息银两”与官府经营的典当业·····	韦庆远 (101)
再论董其昌·····	伍蠡甫 (115)
袁中道论略·····	钱伯城 (143)
高启隐居青丘时间及事迹考辨·····	陈建华 (155)
张岱别名、字号、籍贯及卒年考辨·····	何冠彪 (167)
金圣叹史料辨正·····	金德门 (195)
关于《文心雕龙》下篇篇次·····	郭晋稀 (201)
水浒全传注试笔·····	王利器 (209)
两汉书中的“商人杜吴”·····	马伯煌 (241)
《永乐大典》续印本(六十七卷)	

史料价值发微·····	张忱石 (247)
余怀著作考略·····	蒋维钺 (279)
五十年中国史学的一个侧面·····	陈智超 (287)

金元曲字词杂考·····	孙贯文遗稿 (295)
《小说词语汇释》误释举例·····	弥松颐 (307)

墟户录·····	罗继祖 (28、64、142、194、200)
选诗札记·····	金性尧 (208、278)
铃盘小考·····	陈万成 (286)
陈寿又名陈长寿·····	曹文柱 (294)
释《〈隋书·经籍志〉中的疑问》·····	金良年 (306)
枚皋生年考·····	骆玉明 (313)

CONTENTS

Discussions about Zeng Guofan

A Few Questions Concerning Zeng Guofan...Peng Jing	(3)
Zeng Guofan's Crimes of Suppressing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Cannot Be Negated Ye Youming	(29)
On Zeng Guofan and the Tianjin Incident Involving Foreign Missionaries Xu Shanhe	(41)
Zeng Guofan and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Yin Shaoji	(57)
On the Literary Standing of Zeng Guofan Wang Zhenyuan	(65)
 The Domestic Discipline in the Feudal Royal Family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Political Reform Movemen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eng Guangming	(85)
On the "Interest-bearing" Silver Currency and the Government-run Pawn Business.....Wei Qingyuan	(101)
 More on Dong Qichang.....Wu Lifu	(115)
A Little Critic of Yuan Zhongdao.....Qian Baicheng	(143)
A Research on the Time and Deeds of Gao Qi's Hermitage at Qingqiu.....Chen Jianhua	(155)

- A Research on the Alias, Assumed Name, Style Name,
Native Place and the Date of Death of Zhang
Dai..... He Guanyao (167)
- Verify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Jin Sheng-
tan Jin Demen (195)
- Concerning the Order of Essays in *Wen Xin Diao*
Long..... Guo Jinxi (201)
- A Try at Annotating *Shui Hu Quan Zhuan* (A
Complete Account of *Water Margin*)..... Wang Liqi (209)
- “Shang Ren Du Wu” in the Books of the Western
Han and the Eastern Han..... Ma Bohuang (241)
- The Value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Given in
Yongle Dadian..... Zhang Chenshi (247)
- A Research on Yu Huai's Writings..... Jiang Weixian (279)
- One Aspect of the Chinese Science of History in
Fifty Years..... Chen Zhichao (287)
-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Characters and Words in the
Operas of Jin and Yuan Dynasties
..... the late Sun Guanwen (295)
- Verifying the Errors in *Explanatory notes on the*
Words and Phrases in Fiction Mi Songyi (307)

关于曾国藩的讨论

〔编者按〕要是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谁既被人奉若楷模圣人，又被人骂为千秋罪人，那么，恐怕要首推曾国藩了。同是曾国藩，褒贬者持论迥异，就像刘知几所说的：“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我们所以在这里发表一组有关曾国藩评价的文章，想引起一点讨论，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今天的认识水平上和学术空气里，铨核得中是有可能办得到的。

曾国藩对清王朝无疑可以称得上是夔辅苴臣。他的“竖起骨头，竭力撑持”的一生，比起诸葛亮对刘备集团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没有逊色的地方。然而，他殚思极虑、呕心沥血地辅弼的清王朝，已是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沉舟。动摇这王朝基础的，从根本上说，还不只是压迫过甚引起的反抗、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的相互倾轧以及王族间的阋墙之争。延绵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丧钟已经敲响了。曾国藩身居时代漩涡的中心，与他处于对立的，有要把历史推向进步的太平天国革命，有想把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也有腐败的吏治、军纪废弛的军队以及千疮百孔的经济体制，等等。在被旧日史学家推许的所谓“同治中兴”中，曾国藩显然是举足轻重的干城。但是，他毕竟没有回天之力。我们提倡对曾国藩再作些研究，并不是刻意想为他翻什么案，而是企图通过这种研究，对他本人以及这一段历史了解得更细致、更具体一些，对当时的各种关系、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有一种有机的、综合的认识。有结论的事不等于不值得再作研究，何况过去有一部分所谓的结论常常出于政治的原因，含有实用的性质。历史学的目的也并不是得出几条结论就万事大吉。让形形色色的现象按照有机的联系组合在一起，从中显示出内在规律，这本身就是历史学的宗旨。作

为一门科学，历史学自然要有宏观的扫描以及抽象的思考，编年罗列事实近乎雕虫小技，不过，假如宏观而无视事实，抽象到只剩几句结论，再反过来找出若干可以证明这些结论的例证，这样的历史，就未免有些面目全非了。西方哲学家把二十世纪称为分析的时代，不管这种提法是否恰当，他们不满足于停留在已有的对整体的认识，要对事物作具体入微的分析，以此来丰富对整体的认识的做法，对于克服习惯于普遍一概、不愿冥索细推的思想方法是有帮助的。美国当代有位历史学家，叫图克曼(B. W. Tuchman)，她说：“我相信，通过证据比通过别的道路到达理论更为明睿。”这就是说，某些历史即使已有结论，研究者也不妨从事实中再去发现结论，而不是用事实去印证结论。这看法有它的可取处。

我们提倡研究曾国藩的另一个目的，与当前文化建设有关。文化建设需要同经济建设均衡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社会结构上的功能失调。从事文化建设的基础，就是我们国家几千年来悠久久的文化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曾国藩占有一席之地。据整理《曾国藩全集》的同志估计，曾氏一生著述有一千四、五百万字。他虽然没有系统的专门论著，但散见在这些著述中的有关政治、哲学、经济、文学以及个人修养诸方面的见解，对后世却有颇大的影响。这些东西中哪些该剔除，哪些该吸收，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鉴别扬弃，是值得研究的。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著作，大都出自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之手。许多东西今天事实上已经继承下来，只是在理论上对这种现象还缺乏足够的阐述。曾国藩由于同我们的时代离得比较近，政治立场的对立比较直接，所以，这种矛盾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典型，因而也更有利于进行理论分析。盘错足以辨别利器。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曾国藩其人其事，在理论上对这种矛盾加以说明，并且自觉地把这种理论上的认识运用于其他类似的人物身上，那么，对我们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建设，也许能起一点有益的作用。

曾国藩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彭 靖

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因而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人物。

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具有十分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容。曾国藩在这个历史阶段到来以后的三十二年中的活动，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而文化，又涉及哲学、历史、文学以及近代科学技术；而文学，又涉及诗与文两大领域里的许多重要作家、许多重要文体、诗体的创作成就及其理论总结的继承和发展。他在这样十分广泛的领域中的活动，既有明显的劣迹和不足处，又有许多不易弄清其内容而为之作出公认的科学结论的大小事件。这些事件，现存的材料，正反两方面的都比较多，全面搜集、整理、鉴别、辨认、分析，亦不易为。加之，近代史和现代史有其密切联系。与曾国藩有关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使人不无现实的敏感性。于是，对有些方面往往有所强调，夸大；而对另一些方面，则往往有所忽视，缩小。这也就更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曾国藩问题的复杂性，是他本身活动诸方面的内容造成的，也是整个近代史发展中的诸方面的内容造成的，也是他在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的多方面联系和影响造成的。要对这个人物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期得出若干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由这个人物进而对整个近代史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期于近代史上的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得出较为接近或一致的意见，可能就更难了。

我不研究近代史。对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都没有认真考虑

过。在《曾国藩全集》的整理过程中接触到许多生疏的材料，觉得有些和学术界现有的某些论断挂不上钩。有些研究者从曾国藩这里拣出几句话作出一个论断，而另一些研究者又可以从他那里拣出另外几句话把这个论断推翻，或者提出疑议。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实事求是”，确不容易！

这里，就几个争论较多的问题说一点意见，和关心这些问题的同志们商讨，向有关的专家、学者请教。

一

近代中国社会，内有广大人民群众和清王朝的矛盾，外有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其中，夹杂着清王朝与外来侵略者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着，构成极其复杂的情况。当然，主要的是前面两重矛盾。曾国藩无论在前面或后面两重矛盾中，几乎都处于中心地位。对许多事件，都不能不有明显的态度。

曾国藩的一生，就其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发展来看，可以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为界，划分为前期和后期。在后期，自其总揽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政大权，坐镇安庆，指挥湘军进围南京以后，他的思想逐渐出现了较为重大的变化。当然，某些思想、政治主张则基本上是较为一贯的。

对人民的某些疾苦的同情，以“爱民”为口号。以前后相较，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曾国藩早期的诗歌里所反映的某些民生疾苦，这里且不说。咸丰元年，他的《备陈民间疾苦疏》，举民间疾苦三大项：“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于后者，他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沈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这不能不说他从一定的角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

会的某些真实状况，为人民发出了呼吁。后来，在《日课四条·习劳则神钦》中，他说：

人一日所著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若能久乎？

他在这里，把这种阶级对立现象称为“天下最不平之事”。而且用“酣豢”这样的词来形容富贵人家的“逸乐”。在他以前或与他同时的一些士大夫的言论里，是很少见的。在对太平军作战期间，在《劝诫营官四条》中，有“禁骚扰以安民”一条。这一条说：

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掳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他还有“禁扰民之规”。这里，他说：

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要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特撰《爱民歌》，令兵勇读之。

在《批浙江处州陈镇国瑞县稟暂驻归德并饷项军火如何筹措等情》中，说得更为痛切：

本部堂统兵十年，深知爱民之道……闻该镇亦无仇视斯民之心，但素好苛派州县，州县转而派民；又好凌虐弁兵，弁兵转而虐民。焉得不怨声载道？自今以往，当痛戒之！昔杨素百战百胜，官至宰相；朱温百战百胜，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惨杀军士，残害百姓。千古骂之，如猪如犬；关帝、岳王争城夺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爱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愿该镇以此为法，此彼为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祐助。

又说：

凡设官所以养民，用兵所以卫民。官吏不爱民，是民蠹也；兵将不爱

民，是民贼也。

而在《巡捕门印签押》中，则说：

凡为将帅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要义；凡为督抚者以不需索属员为第一要义。

故在家信中，他说：“余在外立志以爱民为主。”并说：“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此也。”尽管他这样说，这样做，他统率的湘军仍然有扰民害民之事。他也并不讳言。在一封家信里，他曾说：“……所虑者，败兵二万人拥塞祁门，满坑满谷，所在抢掠。油盐百物，皆无可买。”此亦可谓诚而无欺。故章炳麟在他的《检论·近思》里说：“曾、左知失民不可与共患难，……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又说：“而皆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强死。群校所推，以曾、左为主。”章炳麟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是鞭挞不遗余力的。他在《检论·杂志》里，曾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然而，他并不抹煞曾国藩“知失民不可与共患难”，且说“民之得伸，自曾、左始”。足见曾国藩所说的，并不是违心之言。这也不难理解。孔孟的学说是强调民心的向背对于一个政权的稳定与否所起的作用的。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较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大都懂得民心向背的重要性。“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说，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他们往往从民心的向背来考察政治的得失。曾国藩是从反复阅读《二十三史》入手来研讨所谓经济之学的。他当然能深切懂得这个道理。他要维护和巩固封建的伦理秩序，就必然要争取民心。他反复强调“爱民”、“养民”、“卫民”，是高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物的。从这个角度说，他所以强调这些，也无非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也不是完全没有减轻疾苦的作用的。有些人认为曾国藩是“伪君子”，他说的许多动听的话，都不是发自内心的；他做的一些似乎不坏的事，都是为了制造某种假象以欺人。我不这样看。就信奉孔孟学说来说，他

是真君子，不是“伪君子”。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说曾国藩“其无学不窥，默究精要，而践履笃实，始终一诚”。“诚”就“诚”在这里。他在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把在不同方面具有才能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个“诚”字是起了作用的。章炳麟说曾国藩“平生陟迫，喜修小怨；既得志，始慕修名，渐忍性为大度。赏劳举功，未尝先姻私。位至将相，功名已盛，而国藩家人络纬堂居，不改先畴题署”。与此是不无联系的。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首先提出太平军与老百姓的关系。痛诋其对老百姓的扰害现象。就是在上述的认识基础上所采取的对太平军作战的一种精神策略。当然不一定都符合事实。太平天国运动，我以为可以莫都南京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为一个反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而起的运动，无疑是正义的。在纪律上的要求是较为严明的。这也体现了正义之师的一个重要特色。但以其始终是一个小生产者的运动，加之领导者的意志不一定都能变成整个起义队伍的实际行动，因而发生某些违反纪律要求的现象，是不足奇怪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外国人写的《太平天国初期纪事》，就写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叛军占领了三座城（即永安、水窦、莫村），即行安民。生命财产，秋毫无犯。”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叛党的成功，并不能使他们的事业得到荣誉。他们足迹所至，都携掠烧杀，攻陷城市后即施行罕见的洗劫，受害的人民毫无理由受到这种荼毒。因为他们本来便在帝国的苛政下受难。叛党中的知识分子和富人并不赞成这些令人叹惜的暴行，然而无力制止。”这也许不是毫无根据。而从《殷右树指挥告获港人民札谕》中“……再敢迟延限期，定即尽行剿洗，决不稍宽”之语看来，则是的而有据了。而其跨入后期，即开始了它的蜕变过程。愈到后来，就几乎完全变了质。其中，正义的进步的因素虽不无保存，然已不起大的作用；而前期未能克服的一些弱点，则

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所以章炳麟虽是赞成太平天国的，而在《检论·近思》里也不得不说：“洪氏以夏人挾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闻，又横张神教以轶干之。”

当然，曾国藩对太平军战士也是极其残酷的。他在日记里就曾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擄多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从这几句话，亦可见其狰狞之状。既不以多杀为悔，那么，稍有嫌涉者自亦不免血刃相加了。

这里，应该指出：曾国藩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出发，罪及无辜，与太平军前期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大兴义师中未能克服的某些纪律执行上的缺点，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这里，我想说一个与此相联的问题，那就是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强调的“维持名教”问题。

章炳麟在《检论·近思》里说：“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卫保乡邑，非敢赞清也。”不但如此，曾国藩留下的著作和钞纂之类的文字不下一千五百万字，我们翻阅了一大部分，还没有发现他对当时的革命人民提出的“反清复明”的口号有所诋诬的话。相反，他对顾亭林等明代忠烈之士还倍加赞颂。后来，他在南京为王船山刊行遗书，章炳麟也以为“可谓知悔过矣”。当太平军东下金陵以后，他奉清王朝之命，率湘军出境作战，正如李元度在《曾文正祠雅集图记》里所说：“……濒死者数矣，而公百折不回……”，究竟为了什么？他说：“不但为亿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见《讨粤匪檄》）。这里存在着一场尊孔与反孔的斗争。论者每于曾氏全加否定，而于太平天国则全加肯定。我以为二者都未免失之片面。近于《光明日报》读谷牧同志《孔子研究·发刊词》，获得很大启示。这篇文章于肯定“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以后，指出：要“以历

史上的‘尊孔’和‘反孔’为鉴，既不盲目地推崇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对之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是主张把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科学的对象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平天国时期，洪杨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孔子，把孔子包括其学说的精华部分全都加以否定；而曾国藩则从右的方面来推崇孔子，把孔子包括其学说的糟粕部分全都加以肯定。今天看来，都是和我们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的。而细加研讨，我们会发现：太平天国的首领人物否定孔子，主要不在否定封建伦理，而在于肯定“皇上帝”的独尊。相反，他们对封建伦理几乎全部承袭下来，有些方面如等级制度、男女之别还变本加厉。甚至连曾国藩尚不愿意做的，他们也做了。这也可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曾国藩的态度如何呢？

我最近读到一本新出的《左宗棠评传》，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作者写道：这“是鉴定左宗棠是否具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爱国特点的试金石。如果把他战争期间的言与行与曾国藩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是坚定的爱国派，一个是彻底的投降派，形成尖锐的对照”。定曾国藩为彻底的投降派，根据是什么？作者引了曾国藩在《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后写的家信中的这么两段话：

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自英夷滋扰，已历五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稍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海疆平定以来，政简人和，雍熙如旧。

这确是曾国藩的话。根据这两段话，是否可以定他为彻底的投降派，暂且不说。先看看在此时期他另外几封家信中的一些话：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给他父母：

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

十月十九日给他父母：

英夷之事，九月十七日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二名，斩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给他父母：

英夷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

二月二十四日给他父母：

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城，尚未收复。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之。

四月二十七日给他祖父母：

英夷去年攻占宁波府城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静如无事时，想不日可殄灭也。

六月初十日给他祖父母：

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滋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天津防堵甚严，或可无虑。

七月初四日给他父母：

逆夷在江苏滋扰，于六月十一日攻陷镇江，有大船数十只在大江游弋。江宁、扬州二府，颇可危虑。

从上述这些话，可见他认为英国侵略者是“极可痛恨”的，助寇为虐的汉奸是“丧尽天良”的；而于“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滋扰”是不满的，怎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曾国藩竟是一个和左宗棠对立的彻底的投降派呢？如果联系他的诗七律《酬九弟四首》之二来看，问题也许更清楚，诗云：

汉家八叶耀威弧，冬干春胶造作殊。岂谓戈铤照京口，翻然玉帛答倭奴！故山岂识风尘事，旧德惟传嫁娶图。长是太平依日月，杖藜零涕说康衢。

这诗正写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起联夸耀过去的武功文治；颌